

# 唐代货币史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杨心珉

**摘要:** 货币不仅仅是国家认同的结果,还能够通过文字信息的传播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建构方式。唐初时,政府对钱文形式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作为文化符号的开元通宝钱式之宣传效率大大提高,其成功模式及经验直到唐朝衰亡后仍然被后世政权继承参考。尽管初唐时社会中私铸行为盛行,但当时社会对官钱形制的认可度以及官钱本身的通行度已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唐初货币制度的建构基本还是成功的。另外,乾元重宝发行后的社会问题说明,政治权力不能被视作为国家认同的来源,而乾元钱币值下跌后的影响又说明,将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的作法,同样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 唐代; 货币史; 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 杨心珉,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唐代货币史研究”(CXZZ13\_0383);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艺术品传播与艺术创造活力研究”(14DH49)。

**中图分类号:** D0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6.01.007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均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而在历史学领域,也涌现出大量从国家认同角度展开讨论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果绝大多数都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作为主要切入点,故所涉时代与内容都稍显狭隘,而事实上,国家认同应是一个旁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广阔概念,它所引领的思路自然不应局限于一隅。2010年,欧阳彬在《青海民族研究》发表了《论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一文,该文虽主要以现代货币作为研究对象,但却揭示了货币经济与国家认同间的密切关系,故笔者以唐代货币史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期为从国家认同角度探索社会经济史问题的新尝试提供部分有益的经验。

## 一、开元通宝钱的文化符号属性: 作为国家认同建构方式的货币

在货币产生的最初阶段,金属的质量、品质与货币的价值息息相关,而这一指标在日常交易中却极难验证,因此货币的流通需要权威机构给予一定的质量保证,政府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因此“一般认为,政府承担的任务最初当然不是制造货币,而是担保普遍地被用作货币的那些东西的重量和成色”<sup>[1]28</sup>。另一方面,纷繁复杂的货币形态必将造成棘手的兑换问题,因此“统一的货币大大有助于人们进行价格的比较,因而能够促进竞争的深化和市场的发育”<sup>[1]25</sup>,这进一步加快了铸币权的集中,最终使之完全归属于国家。即便是在个别开放私人铸钱的特殊时代,所铸货币的形制也多照搬官钱。换言之,国家通过在信用领域的权威性取得铸币权,并使货币获得在社会中的流通地位,从这一角度看,货币本

身可以看作是国家认同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是否是货币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全部内容。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软实力。在这其中,如何利用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符号,以调动人们共属一体的想象显得十分重要”<sup>[2]</sup>,而事实上在古代,政府同样需要这类符号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而具有流通性的货币无疑是行使这一功能的极佳选择。“早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之前,专制君主们都努力将他们的印章或头像镌刻在他们发行的货币上,从而宣扬他们的权力和威望”<sup>[3]51</sup>,从这一角度看,货币不仅是潜在信用的结果,还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信息传递增加民众的国家认同,这是研究者们所应该意识到的问题。

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古代货币主要以文字传递信息,而自秦汉以来,钱币文字的内容以记值与记重为主,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一些政权开始发现货币的流通性与政治宣传间的切合点,利用钱文信息的传播增强其政权的影响力,以图获得更多的国家认同,在激烈的斗争中占据先机。如十六国成汉政权昭文帝李寿与夏政权创建者赫连勃勃先后以年号作钱文,铸造发行了“汉兴”钱和“大夏真兴”钱,开中国货币史上年号钱之先河,而从字面上看,这两个年号本身就具有政治鼓吹的意味,因此这两种钱币可以被视为以货币用作宣传的早期尝试。据《隋书·食货志》载,北周时,周武帝与周宣帝先后铸造了“五行大布”与“永通万国”钱<sup>[4]691</sup>,而从钱文内容来看,这两种钱币均有通行天下的意味,但周宣帝发行“永通万国”钱时,南方的陈政权尚未覆灭,而周武帝发行“五行大布”钱时,北方尚有北齐政权与其分立,从这一角度看,二钱钱文震慑对手的政治宣传作用,就显得比较清楚了。隋朝建立后,隋政府发行了隋五铢新钱,但“五行大布”与“永通万国”钱仍在民间通行,即便政府下达了“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sup>[4]692</sup>的命令,已经流入社会的这两种钱币一时也难以禁绝,一直沿用到开皇五年以后。这一经验可能得到了此后的唐朝统治者继承,最终成就了开元通宝货币符号的成功。

从钱文上看,“开元”有开辟新纪元的意味,可见开元通宝钱的政治宣传意味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与“五行大布”与“永通万国”钱发行的背景稍有不同,在开元通宝铸行的武德四年七月时,唐王朝刚刚击败王世充与窦建德两个关东地区的最大割据势力,基本上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然而在局部地区,小股的抵抗力量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山东,窦建德部将刘黑闥已经纠集旧部起兵。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货币,一方面可以昭显政府击败对手的成果,一方面可以稳定占领地区的民众情绪,而为了成功打造这一货币符号,唐政府也作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自先秦以来,中国钱币的钱文多由篆体书写,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通行的字体早已完成了由篆至隶的“隶变”时期,进入了由隶入楷的“楷变”时期,但绝大多数的货币仍以篆体书写钱文,社会辨识度很差,如据《宋书·何尚之传》载,刘宋时江夏王刘义恭便曾指出当时通行的各类钱币“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sup>[5]</sup>,可见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货币文字在此时早已落后于时代潮流。当然,字体上的问题对货币的流通并不能造成太大的阻碍,但如果要考虑利用钱文进行政治宣传的话,这种不应时风的落后面貌必然将影响文字信息的传递效果,因此针对这一情况,唐政府在设计钱币时作出了相应的改革。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通宝钱钱文包含“八分、隶、篆”三体<sup>[6]</sup>,但从现存实物看,其钱文结构方正,已走出篆书圆转的框架,基本呈现出隶分书体的风貌,即便是今人也能顺利识读,从而解决了长久以来存在的钱币文字晦涩问题,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

尽管在字体中增加隶分书的笔意使得钱文的通俗性得到了提升,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唐政府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隶分书注重用笔的节奏变化,故其笔画往往时粗时细,甚至带有极为夸张的波磔,而这种风格在铸造过程中极易造成钱文的雍滞粘连,从而影响成品的效果。如前文提到的“汉兴”钱,即以隶分书书写钱文,但由于其对隶分书的笔画特点不加修正,因此使得成品“文字多浮浅漫漶”<sup>[7]</sup>,

不仅影响了信息的传递效率，还会使本想传达的新朝气象反遭破坏。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唐政府又继承了篆书钱文粗细均一的特点，刻意弱化了隶分书的笔势变化，如将“通字”带有波磔的一捺变为平横，将“元”字第二笔长横的波挑转为折笔等，使得最终成形的钱文不仅通俗可识，而且清晰可辨，成为了中国货币史上以精整明洁为特点的经典范式。

由于符号对提升国家认同的帮助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我们无法找到直接体现开元钱宣传效果的证据，但唐朝衰亡以后开元钱式的延续和转化，却能让人从侧面窥见这一符号成功之一斑。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再次陷入了分裂的局面，而对于割据一方的许多势力来说，证明己方政权作为唐政延续者的合法性正是其生存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和建国于福建的闽政权均铸造了开元通宝铅钱，而以李唐后继自居的南唐统治者，更是发行了篆书开元通宝以及当十开元通宝两种新开元钱。从外观形制来看，这些钱币与唐时的开元通宝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单单因继承通行已久的唐钱钱文而获得太多流通上的便利，因此这些势力执着于开元钱文的目的恐怕另有所属。欧阳彬在其文中提到货币的一种“激励功能”，他称：“货币虽然是经济现象，但它的发行和流通包含着有关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信念。它具有超越认知的情感意志”<sup>[8]52</sup>，由此看来，五代时期的割据势力对开元钱式的继承，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其残存的“激励功能”的希冀，其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动乱背景下怀念故国的社会心理，收集前朝流散于社会的剩余国家认同，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开元钱式在唐代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为提升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帮助，这一事实足见其作为政治文化符号之成功。

与此同时，位于中原而实力稍强的正统王朝则在试图复制开元通宝的政治宣传模式，以图打造新的货币符号，谋求新政权在社会中的国家认同。传世有汉元通宝钱，史料未载其出处，南宋洪遵《泉志》据《续通典》所载膳部郎中罗周裔上言请在京置钱监事认为该钱应铸于后汉隐帝乾祐元年<sup>[8]163</sup>，其说可信。另有周元通宝钱，据《泉志》引《开谭录》载：“世宗朝铸周通元宝钱，于后殿设巨炉数十，亲观鼓铸”<sup>[8]164</sup>，可知其为后周物无疑。除此之外，尚有宋元通宝钱，据《宋史·食货志》载：“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sup>[9]</sup>，可知此钱为北宋最初铸币。这三种钱币形制完全模仿开元通宝钱，惟改易国名以示区别，当“开元”转变为“汉元”、“周元”、“宋元”之后，新的政治含义便随之形成，这不失为一种简便取巧的办法，而从这些政权对前朝钱式的执着中亦可看出开元通宝钱式在唐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货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确实能够给予很大的帮助，而这恰恰是今世学者在探究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时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

## 二、初唐的私铸现象：认知国家认同的角度

在承认开元通宝作为货币符号对传播国家认同作出贡献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初唐时期私铸行为的盛行。事实上据《旧唐书·食货志》载，早在开元钱发行后不久，社会中便已出现“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sup>[10]2094</sup>的局面。为了打击私钱，唐政府于仪凤四年以和巢的办法收销私钱，但为效甚微，后不得不在武周长安时下令“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sup>[10]2096</sup>，默许了私钱的流通。玄宗即位后，又采纳宋璟意见，以直接收缴的办法打击私铸，百姓“乃以上青钱充恶钱纳之，其小恶者或沉之于江湖，以免罪戾”<sup>[10]2097</sup>，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政府不得已再次放弃了对私钱的打击，而禁之不绝的现象说明，私钱在唐代有着深厚的社会认可度的。欧阳彬在其文中指出，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一种国家认同，其根源在于它是国家主权建构的产物”<sup>[3]50</sup>，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唐代的私铸行为都与其他时期一样，是对国家铸币权的公然挑战，那么这是否能作为开元通宝并没有很好地获得民众认同的依据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整体局势的动荡,货币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尽管在这段时间,许多割据政权都铸造过自己的货币,但新钱在发行之后往往遭到社会的抵制,而在流通中能够获得更多信任的,往往是以五铢为代表的前朝古钱。据《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十九年,北魏政府发行太和五铢钱,但至孝明帝时,“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贷不通,贸迁颇隔”<sup>[11]</sup>,又《隋书·食货志》载南梁铸钱事称“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sup>[4]689</sup>,而从客观的角度看,这种阻滞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原因而造成的。比如从现存实物看,在南梁通行的各种古钱中,直白五铢与五铢在质量和品质上优于梁五铢钱,而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则不如之,因此无论这些钱币在当时是以何种比例流通,处于中间状态的梁五铢似乎都没有被排斥的理由,可见这种对新钱的排挤,可能与政权威信、民族情绪、政策信用乃至时代情节等较为抽象的因素有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古钱在那个时期社会中的高认可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私铸货币的面貌。考查史料可知,当时黄河以南地区流行一种自铸币,称“土货”或“土钱”,如据《魏书·食货志》有“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sup>[11]2864</sup>之语,同书又载称“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sup>[11]2864</sup>。查北魏任城王元澄的奏言中,有“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sup>[11]2865</sup>之语,由此可知,这种地方货币的真面目,应是模仿前代钱式而制的“生新古钱”了。另外,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中,收录有大量取材于五铢钱式的民铸钱币,其中一些文字书写不规范,部分偏旁侵入外郭,称为“侵轮五铢”,另有一些钱文分别作“五朱”“五金”“五工”“五王”“五五”等,亦是汉五铢模式中脱出<sup>[12]</sup>。据《通典》载:“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于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朱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于余钱”<sup>[13]190</sup>,由此可知,在排挤梁五铢新钱的各种古钱中,也有部分属于前代所铸私钱。以上事实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官方发行的货币本身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连官方制定的货币样式也不为私铸者所采用,从文献“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的描述看,这些特殊的私钱之间互相又因铸造地的不同而自相竞争,几乎完全忽视政府的调控,可见至少在货币领域,当时的政权是获得不了多少国家认同的。

开元通宝发行后,尽管私铸行为仍然在社会中普遍流行,但私铸钱币的形制已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据《旧唐书·食货志》载:“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sup>[10]2096</sup>,同书又载开元初宋璟禁私钱时,“百姓乃以上青钱充恶钱纳之,其小恶者或沉之于江湖,以免罪戾”<sup>[10]2096</sup>,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唐代的私钱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钱”,其形制完全仿照官钱铸造,说明当时的私铸者本质上是认同官钱样式的权威性的,这一区别无疑值得注意。在私钱于社会中流行的同时,官钱的通行并未出现阻滞的现象。据《旧唐书·食货志》载,武周时政府曾有通货中“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sup>[10]2096</sup>的命令,前代学者多以材料中的名目为当时私钱的种类,但细考细节就会发现,“熟铜”“厚大”均为对优良材质的描述,又《旧唐书·食货志》有“排斗钱”出于太府左藏库的记载<sup>[10]2099</sup>,可见“排斗”所指的亦是官钱,至于与之并列的“沙涩”,可能指未经流通,钱体尚不光滑的新钱,由此可知,当时专门有人在通货中捡择质量上乘的官钱,又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时“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sup>[6]1386</sup>,这正是拣择官钱的利益所在。尽管这种民间比价不得官方承认,但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在私钱于社会流通的同时,官钱的地位并未因之受损,而是因较高的质量自动成为了相对的高值货币,这与魏

晋南北朝时期官钱认可度低于古钱、私钱的情况又有明显区别。由此笔者认为，初唐时期社会中存在私铸盛行的事实，但这主要是由于官钱的铸造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造成的，与唐政府的国家信用没有太大关联。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对于官钱形式的认可度以及官钱本身作为法定货币的通行度都远远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换个角度看，尽管铸币权受到了来自民众的冲击，但私钱形制样式和流通方式的改变还是说明了社会对政府渐进式的依从，因此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唐初的钱制无疑还是成功的。

### 三、乾元重宝铸行的风波：政府权力与国家认同的平衡

对于私铸盛行问题的分析不仅说明了唐初钱制较之前代的进步，也说明了尽管货币可以被认为是国家认同的结果，但铸币权并非是国家认同的绝对来源。在近现代，“价值强加”（valor impositus）学说仍然在理论界发挥作用<sup>[6]28</sup>，但事实上，如果过度预估政府权力对获得国家认同的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极有可能陷入“名目主义”的漩涡而失去原有的威信和地位。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为了实现资源的快速聚集以应付战事的需要，发行了乾元重宝大钱。据《通典》载：“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乾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一十文。又铸重轮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sup>[13]203</sup>，这种人为的通货膨胀政策旋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物价因货币贬值而猛涨，“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面值虚高，私铸的利益也伴随着官钱而大涨，以致“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象，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纵，数月间拷死者八百余人”<sup>[10]2100</sup>，社会经济陷入入唐以来空前混乱的局面中。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市场以维持生计，时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保障贸易的畅通，“乃拾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三十”<sup>[14]</sup>，将原本通行的开元钱拔高为与乾元钱等价的“虚钱”，以维护兑换交易的平等性。从本质上看，这一措施等于重新界定了乾元二式钱与开元钱的币值，可以说是对唐政府施政方略的明确挑战，也说明此时乾元二式钱在社会中实际已丧失了大部分政府期待的认同，而在上元元年六月，政府下令“其重轮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sup>[10]2100</sup>，承认了社会自行制定的规则，从而为此后乾元二式钱币值的一再调整开了先河。

尽管自被迫承认民间自行制定的币值起，政府对乾元二式钱的功能期待已基本丧失，但客观来看，乾元钱的基本货币地位并未因之受到影响，被收回的在此时仅仅是原本被过高地赋予的那部分职能而已，换句话说，凝聚在其形式之中的国家认同依然在发挥作用，但随着此后的币制调整，这种认同却最终因为政府的另一种施政倾向而消失。哈耶克在其《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认为：“铸币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贬值的历史，或者是铸币的金属含量不断减少、因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断上涨的历史”<sup>[1]33</sup>，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进一步提出“健全的货币只能出自于自利，而不会出自仁慈”<sup>[1]33</sup>的观点，即政府鉴于民众对货币权威性的习惯性依赖不可能向社会提供良币，而乾元钱的币值变动说明，这一判断恐怕是不周全的。代宗即位后，宣布“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sup>[10]2101</sup>，按开元钱每贯重六斤四两，乾元钱每贯重十斤，重轮钱每贯重二十斤，由此看来，如果从单纯的金属价值考虑，此时朝廷制定的1:2:3的币值比率是十分接近三钱重量差异的，也是比较公平的兑率，但在不久之后，朝廷再次修改三钱的币值比，并将之最终确定在“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sup>[10]2101</sup>的比值上，而此举对后世货币经济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大钱最初发行时造成的混乱。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乾元二式钱的最终币值公布后，社会环境迅速由“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的动乱状态转变为“人甚便之”的局面<sup>[6]1387</sup>，事实上，这一转变的出现应是自然而然的事，

因为这一政策意味着乾元钱及重轮钱与开元钱巨大的金属价值差异被政府彻底抛于脑后,而乾元二式钱也迅速由最初掠夺资源的工具转变为直接向社会让利的方式,而这种让利行为的支付者正是唐政府,这不禁让人对这一政策的直接意图产生疑问,而笔者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对稳定政权根基的需求。查《旧唐书·代宗本纪》可知,币值确定于宝应元年七月,而在宝应元年十月,唐王朝发起了与史氏政权的最后一战<sup>[10]270</sup>。此前,在上元二年两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交锋中,唐军在北邙惨遭败绩<sup>[10]270</sup>,尽管在此后,史氏政权内部发生变故,史朝义弑父自立,政局并不稳定,但从单纯军事战争的角度看,此时的唐王朝恐怕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的,换言之,币值更改之际,恰是决定未来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因此,为了实现后方的稳定,确保战争的最终胜利,唐政府于战前将币值变更作为德政和福利发放给社会,也是合乎情理的,可见当时局的发展扑朔迷离,甚至有可能威胁政权架构之基础安全时,政府完全有可能以赚取更多的国家认同为目的实施格外优厚的货币政策,甚至不惜以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为代价以图赢得斗争的胜利,但事实是,这种让利政策让货币经济再次遭受了意外的打击。

马克思曾指出,货币形态是“一般等价形态和一特种商品的自然形态”<sup>[15]</sup>的结晶,从这个角度看,铸币本身的金属材料性质不可能因为其一般等价物的身份而蜕变或消失。因此当货币“在它的铸币形态上,比在它的条块形态上所值较少。分量十足的金榜就会倒过来变成它的条块形态”<sup>[16]</sup>。由于乾元二式钱的面值远低于实际金属的价值,蕴藏在货币外衣之下作为普通金属材料的使用价值开始重新回到铸币的躯壳中。据《旧唐书·食货志》载,币值变更后“民间乾元、重轮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sup>[6]1387</sup>,而时人更是有“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sup>[6]1388</sup>的议论,可见销钱现象之严重。而乾元二式钱也因此完全丧失了货币地位的认同,蜕变为一般物资。而为了弥补乾元二式钱退出流通造成的空缺,时任诸道盐铁转运使的刘晏不得不扩大江淮地区的铸钱规模<sup>[6]1388</sup>,此举虽为政府暂时补充了货币,但庞大的运输费用又增加了远离京师的江淮七监的成本压力,至德宗建中初,江淮七监终因成本倍于利润而一齐罢废<sup>[10]270</sup>,因此说宝应初年的让利政策对后世社会经济亦造成了重大影响,恐怕也是不为过的。由此看来,国家认同绝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的释放而获得的,而同时,国家认同也不应该是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维持二者之间关系的平衡才是政府应行的责任。

##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货币不仅仅是国家认同的结果,还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建构方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货币的政治宣传功能开始被发现,而到唐初时,政府对钱文形式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作为文化符号的开元通宝钱式之宣传效率大大提高,其成功模式及经验直到唐朝衰亡后仍然被后世政权继承参考。其次,尽管初唐时社会中私铸行为盛行,但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当时社会对官钱形制的认可度以及官钱本身的通行度都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唐初货币制度的建构基本还是成功的。最后,乾元重宝发行后的社会问题说明,政治权力不能被视为国家认同的来源,而乾元钱币值下跌后的影响又说明,将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的作法,同样是不可行的。

### 参考文献:

- [1] (英) 哈耶克. 货币的非国家化 [M]. 姚中秋,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 [2] 吴玉军. 符号、话语与国家认同 [J]. 学术论坛, 2010 (12): 75.
- [3] 欧阳彬. 论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J]. 青海民族研究, 2010 (3).
- [4] (唐) 魏征. 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5] (南朝) 沈约. 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35.

[6] (宋) 欧阳修.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384.  
[7] 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22.  
[8] (宋) 洪遵. 泉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9] (元) 脱脱.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375.  
[10] (后晋) 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1] (南北朝) 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863.  
[12] 汪庆正. 中国古代货币大系·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323.  
[13] (唐) 杜佑. 通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4] (宋) 王钦若. 册府元龟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5687.  
[15] (德) 马克思. 资本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70.  
[16] (德)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77.

##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ang Dynasty

Yang Xinmin

**Abstract:** Currency is not only a form of na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of character informatio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government reforms of currency character promoted the propaganda efficiency of Kaiyuan Tongbao currency as a cultural symbol. The successful model and experience was inherited and referred to by following regimes aft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ang Dynasty. Although private minting was prevalen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social recognition of the form and system of official currenc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t had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S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ency syst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basically successful. Besides, social problems emerged after the issue of Qianyuan Chongbao showed that political power couldn't be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fluences of decline of Qianyuan currency showed that it was infeasible to take national identity as the purpose of exec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Key words:** Tang Dynasty; history of currency; national identity

(收稿日期: 2015-11-30; 责任编辑: 沈秀)